

The Spatial, Approach and Theme Biases in the American Journalism Studi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1259 Articles

Wang Dali

Abstract: In the past decade, American journalism studies have shown a better global perspective in space, but there are also spatial biases centering 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quantification centered approaches and classical functionalism centered themes. On the one hand, the global perspective in space is the positive response to the globalization trend. On the other hand, many biases in journalism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reflect its rejection of the pluralistic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 outlook, values and functional outlook bred under different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Key words: American journalism studies; Spatial biases; Approaches biases; Themes biases

Received: 2020-11-01; Accepted: 2020-12-10; Published: 2021-01-18

美国新闻学研究的空间、方法与主题偏向：基于对 1259 篇研究性论文的分析

王大丽

摘要：近十年来，美国新闻学研究在空间上表现出较好的全球化视野，但也存在以美国和欧洲为中心的空间偏向、以定量研究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偏向和以古典功能主义为中心的主题偏向。

作者简介：王大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

课题项目：本文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部校共建新闻学院一流课程建设项目《新闻学概论》”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文章引用：王大丽. 美国新闻学研究的空间、方法与主题偏向：基于对 1259 篇研究性论文的分析[J]. 中国新闻评论, 2021, 2(1): 61-73.

<https://doi.org/10.35534/cnr.0201006>

一方面，空间上的全球视野是美国新闻学研究对新闻生产全球化趋势的积极响应，另一方面，空间、范式和主题存在的偏向又反映出美国新闻学研究对不同制度、文化背景下孕育的多元新闻职业观、价值观和功能观的排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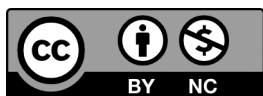
关键词：美国新闻学研究；空间偏向；方法偏向；主题偏向

收稿日期：2020-11-01；录用日期：2020-12-10；发表日期：2021-01-18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当前，在发展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战略背景和日渐激烈的全球新闻学术话语竞争态势下，如何不断提高中国新闻学的国际参与度、影响力和话语权，成为中国新闻学者关心的重要问题。在谈及具体发展策略时，学者们普遍认可两条路径：一是立足中国本土、总结中国模式。二是学习和借鉴外国的优秀做法。目前，对于前者，学者们有了日渐丰富的讨论。但对于后者，一方面，国内有关国际新闻学研究现状和趋势的成果不多，可借鉴的资料欠缺，另一方面，国内新闻学者的国际发文量较低，在全球新闻学研究场域中产生的影响力较弱。众所周知，美国新闻学研究依托于其强大的政治、军事、经济和科技实力，以及先进的新闻生产、媒介管理和新闻人才培养模式，在国际新闻学研究场域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即使强劲如欧洲批判理论，在进入美国时，都会成为被分插到整个学术光谱中的一支，批评性明显削弱^①。那么，美国新闻学研究的现状如何？其在研究范式上有何特征？对中国新闻学研究有何可资借鉴的地方？本文将 2010—2019^② 年间发表在美国新闻和传播权威期刊上、属于新闻学^③ 范畴的研究性论文（Article）为个案，考察其在空间、方法、主题选择上表现出来的特征，呈现美国新闻学研究

① 李金铨. 传播纵横：历史脉络与全球视野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②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只收录了 Journalism 2011 年以来的数据，因此，它的样本范围为 2011—2019 年。

③ 本文将新闻学研究视作传播学尤其是大众传播学研究的一个分支，侧重于对大众媒体尤其是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社交媒体的内容生产、信息传播与受众反馈等研究。不包含涉及电视剧、电影、戏剧、音乐等其他类型大众传播的相关研究，也不包含纯粹的传播理论、传播研究方法、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群体传播等内容。

的整体趋势，进而为中国新闻学研究提供有效的借鉴。

一、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对象的筛选步骤如下：（1）进入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的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界面，在传播学收录的 88 本期刊中，筛选出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大于 2 且出版地为美国的 11 本期刊。从中剔除带有明显专业方向倾斜性的 5 本（侧重报纸和政治关系的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①，侧重科学传播的 *Science Communication*，侧重媒介哲学的 *Media Psychology*，侧重广告研究的 *Journal of Advertising Research* 等）后，选择《传播学报》（*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人类传播研究》（*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传播理论》（*Communication Theory*），《传播研究》（*Communication Research*），《新闻学》（*Journalism*），《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共 6 本专业期刊；（2）在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以 2010—2019 为检索时间段，分别以上述 6 本期刊名称为关键词进行“出版物名称”检索，剔除 News、Essay、Book review 等文献类型，只留取 Article，分别获得 492、231、201、428、691、407 条有效信息；（3）剔除纯粹的传播理论、传播学研究方法、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公共关系、广告、电影、电视剧、戏剧、音乐等领域的论文，共获得 1259 篇属于新闻学研究范畴的文章，作为本文的核心研究对象。

二、研究方法及变量设定

本文使用 Citespace2、SPSS 作为文献分析的主要工具。其中，Citespace2 主要用于对样本所涉及的作者及其合作关系、共引期刊与文献、关键词聚类等问题的分析。SPSS 则主要用于作者国籍、论文关注国家/地区、研究方法、研究主题等问题的分析。

SPSS 的统计变量主要包括：（1）作者国籍。（2）第一作者国籍。（3）论文关注的国家/地区。（4）研究方法：整体分为定量研究、定性研究、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混合研究、其他。其中，定量研究包括调查法、实验法、内容分析法、其他定量研究法、定量综合等，定性研究包括个案分析法、田野调查法、人种志或民族志、文献分析法、其他定性研究法、定性综合等。（5）研究主题包括：a. 关注的媒体类型（报纸/杂志、广播、电视、通讯社、互联网、融媒体、

^① 《国际媒介政治学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虽然刊登了大量的新闻学研究论文，但是它侧重于对“媒体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也即媒体与政治组织、政治与媒介组织、有关政治的报道、政治传播行为、政治与新闻行为等主体间关系的考察。对媒体与社会、经济、文化、教育、技术以及新闻职业本身的关注较少。

社交媒体、新闻管理机构、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关系、综合、无明显区别^①)；b. 新闻职业及其与其他要素的关系（新闻与政治、新闻与社会、新闻与经济、新闻与文化、新闻与教育、新闻与技术、新闻与其他、新闻职业本身、其他）；c. 新闻生产及其相关要素（新闻生产活动、新闻从业人员、受众、新闻从业人员与受众关系、新闻研究活动、新闻研究者、新闻教育活动、新闻教育者、新闻学学生、其他）。为了更加微观地考察新闻生产及其相关要素的具体指向，笔者又在其下设置了二级指标（见表 1）。需要说明的是，该二级指标的统计不是以文献为单位而是以指标本身的数量为单位，即一篇论文中每涉及一个二级指标则计数为 1 单位，若同时涉及两个则计数为 2 单位，以此类推。这种统计方法是为了避免一篇论文中涉及多个指标导致的遗漏而设计的。

表 1 研究主题 c 类一级指标及其二级指标

Table 1 Research topic class C first level indicators and its second level indicators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新闻生产活动	新闻来源、新闻价值、新闻选择与把关、媒体表达与呈现、新闻生产模式、新闻生产场域、新闻生产困境、媒体（范式）转型、媒体社会参与、媒体政治参与、媒体公信力、媒体影响 / 影响力、媒体责任与义务、媒体形象塑造、媒体组织 / 制度、媒体成本 / 收益、媒体（内容）管理、媒体自治与新闻自由、新闻行业规范与伦理、新闻行业文化、新闻行业危机、意识形态与宣传模式、舆论、跨文化传播、其他
新闻从业人员	记者角色（认知）、记者政治参与、记者社会参与、记者生存现状、记者新闻理想、记者职业规范、记者职业危机、记者职业发展 / 创新 / 转型、记者职业评价、新技术习得（认知）、记者性别、记者形象塑造、记者影响力、其他
受众	公民身份与权利、受众情感与体验、受众媒介使用、新闻消费、受众参与、受众类型、受众角色、受众形象、受众偏好、受众社会 / 群体认同、受众信任、受众测量、其他
新闻（从业人员）与受众关系	记者—受众互动、公民新闻 / 记者、受众生产内容、其他
新闻研究活动	学术群体、学者理论认知、学术研究的范式危机 / 转型、概念 / 理论模型（创新）、学术研究本土化、新闻学科发展、新闻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互动、其他
新闻研究者	
新闻教育活动	教育哲学、教学方法、伦理教育、职业训练 / 教育、教育转型、新闻实习、跨文化教育 / 学习、其他
新闻教育者及学生	

三、研究发现

（一）面向全球但以美国和欧洲为主体的空间偏向

本研究所选取的 1259 篇论文共由 2578 位作者完成，他们来自 61 个国家和地区的 639 家研

^① 为避免变量统计重复，明确提及以“internet”为核心研究对象的论文计入“互联网”，明确提及以单纯的“media convergence”“media fusion”等为核心研究对象的论文计入“融媒体”，明确提及以单纯的“social media”为核心研究对象的论文计入“社交媒体”。

究机构。在关注区域上, 51 篇论文以全球为考察视野, 其他 1201 篇关注了 98 个国家和地区。整体上表现出较好的全球视野, 然而, 从绝对数量来看, 不论是在作者国籍、关注国家和地区上都以美国和欧洲为主。

第一, 从作者国籍来看, 2578 位作者中, 共有 1310 位作者来自美国, 占总量的 50.8%。799 位作者来自欧洲, 共分布在欧洲 21 个国家, 其中以英国、荷兰、德国籍作者居多 (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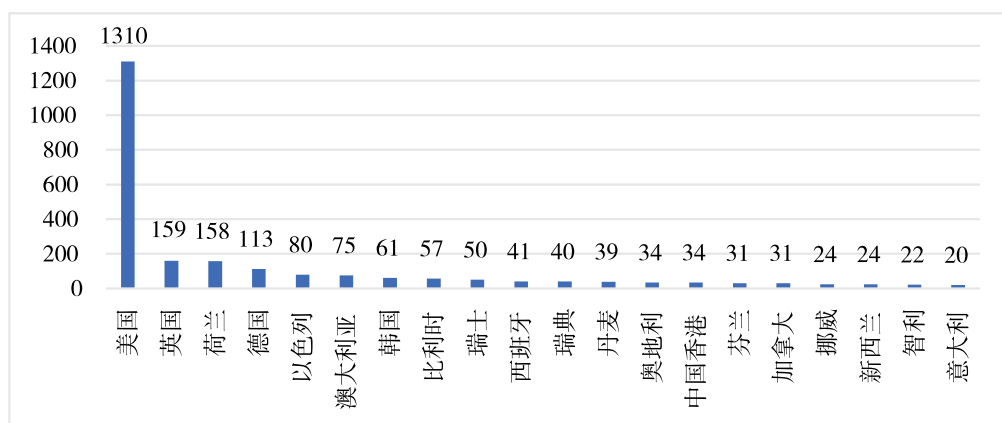


图 1 2578 名作者的国家 / 地区分布 (频次 ≥ 20)

Figure 1 Country / region distribution of 2578 authors (frequency ≥ 20)

第二, 从作者所在机构来看, 威斯康星大学、德克萨斯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发文量均超过 40 篇。从机构合作关系 (见图 2) 来看, 639 家研究机构形成一个连通较为紧密的合作网络。合作频次大于 15 的 15 家研究机构全部为欧美 (美国 11 所, 欧洲 4 所) 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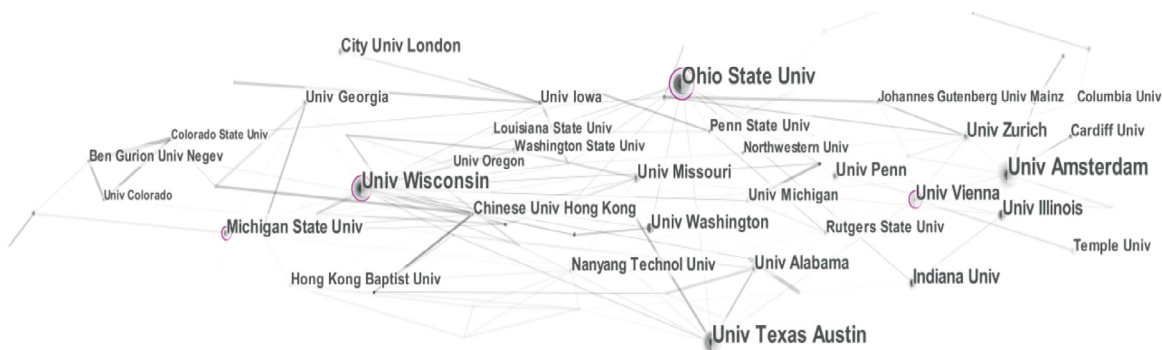


图 2 2578 位作者所在机构合作关系网络

Figure 2 Cooperation network of 2578 authors

第三，从论文关注国家和地区来看，排名前八位的依次为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全球、中国大陆、以色列、德国、丹麦、荷兰。此外，笔者对论文的第一作者国籍、作者国籍共现、论文关注国家/地区的排名情况进行总体考察后发现，美国、英国、德国在上述三个变量上都位居前列。而荷兰、以色列、澳大利亚、韩国四个国家虽然在具体的排名次序上略有不同，但也都进入了三个变量排名的前九位（见表 2）。这说明，本研究选取的专业期刊更倾向于选用来自上述七个国家作者的论文，同时，对上述七个国家的关注度也更高。

表 2 第一作者国籍、作者国籍共现、论文关注国家/地区排名对比

Table 2 Comparison of first author nationality, co-occurrence of author nationality and countries / regions concerned

第一作者国籍	美国	英国	德国	荷兰	澳大利亚	以色列	韩国	丹麦	比利时
频次	657	105	54	54	47	44	27	26	23
作者国籍共现	美国	英国	荷兰	德国	澳大利亚	以色列	中国大陆	韩国	奥地利
频次	657	96	75	60	52	48	42	36	30
关注国家/地区	美国	英国	德国	全球	中国大陆	以色列	荷兰	澳大利亚	韩国
频次	459	105	55	51	47	39	38	36	27

（二）以定量研究法为主的方法偏向

当前，美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的主流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定量研究法（也称量化研究法）、定性研究法（也称质化研究法、质性研究法）以及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三类。其中，定量研究方法旨在用数字形态呈现资料，透过计量测量的方法进行，重视研究变项和量化的测量，是实证科学的产物^①。而实证主义贯彻科学主义的传统，强调经验，排斥形而上学，认为人类社会的定律同自然世界一样，可以被验证和检验。它倾向于将客体对象化，在方法上倾向单向度的实证，用自然科学的手段证实或证伪经验，整体遵循科学的经验原则、数量原则和因果原则^②。相比之下，定性研究的重点不在于计数每个变项的数值，而重视更多细节资料和人的描述，可以深入描绘社会现象和人们经验，保留更丰富的意涵^③。Cooper 等人通过对学术期刊进行研究后发现，美国传播研究 1965 至 1989 年间以量化方法为主，直到 1970 年起，质性方法逐渐增加，1990 至迄今，许多研究量化和质性两种方法混合使用变得常见。Weaver 等人也发现混合方法在传播研究领域愈来愈受欢迎^④。对本文选取的 1259 篇论文进行分析后，笔者发现，过去十年间，美国的新闻学研究也呈现出以定量研究方法为主，定性研究法为辅，混合研究法逐渐增多的趋势。具体而言，1259 篇论文中，48.8% 采

① 苏蘅. 传播研究方法新论 [M]. 台湾：双叶书廊有限公司，2019.
② 何志武. 批判研究方法的科学性问题 [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5）：22-27+107-108.

用了定量研究法，其中又以调查法（问卷调查、在线调查、电话调查等）、内容分析法和实验法三种方位为主。调查法（占比16.7%）多用于对社交媒体、互联网用户的相关问题研究，而内容分析法（占比14.4%）则更多用于报纸与杂志、广播和电视的新闻报道（如竞选报道）的框架分析，并常常与政治、舆论、运动、意识形态等关键词一并出现。实验法（占比9.8%）则更多地用于受众测量等媒体效果研究。定性研究方法占比为26.4%，其中又以访谈、个案分析、文本分析、话语分析为主。其中，访谈法（占比7.5%）多用于记者角色认知、受众媒介使用、受众情感与体验等问题的研究，个案分析法（占比4.4%）和文献分析法（占比2.0%）则多用于新闻历史问题的研究。定性与定量综合的整体占比为12.5%，主要表现为内容分析法与话语分析的综合，访谈法与调查法的综合。整体而言，人种志或民族志（占比1.1%）、田野调查（占比0.3%）等方法的使用量较少。其中，人种志和民族志方法多用于从国家制度环境、媒体组织结构、社会文化范式等视角考察新闻（记者）的身份和公共关系等问题。其他研究方法占比12.1%，主要以文化批判、政治经济研究为主，多用于对“报纸/杂志”以及“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关系”的研究中。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新闻学》和《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两本期刊中的论文更倾向于使用定性研究方法，尤其是定性文本分析和定性话语分析。而《传播学刊》《人类传播研究》《传播理论》和《传播研究》四本以传播学研究为重心的期刊则更倾向于使用定量研究方法，尤其是控制实验法和调查法。

（三）以古典功能主义为特征的研究主题偏向

美国新功能主义代表人物杰弗里·C. 亚历山大将功能主义分为古典功能主义和新功能主义两个阶段，并总结了古典功能主义的核心观点：（1）社会是由各个要素互动而形成的开放和多元的系统，这一社会模型可以用经验观察、统计、分析、理解；（2）关注社会行动的实践性、表意性和目的性，并根据行动的目的来关注其行动方式，从行动效果推析行动的动机；（3）注重社会的均衡结构、稳态整合，将系统看作局部均衡的结果，由此关注社会控制效果的实现；（4）在有机体、人格、社会和文化四大子系统之间建立互动性观察，避免单一因素决定论，强调四大系统之间的复杂互动是社会发展演变的动力机制；（5）将社会系统的功能分化看作社会变迁的根源，关注系统发展和制度结构之间的持续性张力；（6）在社会研究中将经验研究和理论概括结合起来^①。笔者认为，本文所选的1259篇新闻学研究论文在研究主题的偏向上表现出明显的古典功能主义特征：（1）认为新闻业自身是一个有机系统，同时，又是社会这一有机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2）从功能的视角入手，考察新闻业与社会其他子系统之间的双向影响关系，并建立二者之间的关联性；（3）将新闻业

^① 吴予敏. 功能主义及其对传播研究的影响之审思[J]. 新闻大学, 2012(2): 22-26.

作为社会分工细化的必然结果，从“职业化”的角度出发建立行业操作规范与原则，并关注新闻职业发展与制度结构之间的持续性张力；（4）通过考察新闻生产活动的产品追溯其生产动机，通过关注新闻生产者的实践性和目的性来关注其行动方式；（5）上述所有问题的研究都是可以用实证方法进行观察、统计、分析和理解的。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1. 以媒体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参与为考察重点的新闻功能观研究

本文分析的 1259 篇论文中，共有 934 篇关注了新闻事业与社会（381 篇）、政治（377 篇）、技术（79 篇）、经济（52 篇）、文化（45 篇）诸要素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且在考察这些关系时，学者们多从“功能”视角入手，讨论新闻事业与其他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考察新闻与政治的关系时，重点关注新闻业在推动民主进程上的主要表现。考察新闻与社会的关系时，重点关注新闻业在个体社会化及公共话语平台的建构上所发挥的作用。考察新闻与技术的关系时，重点关注技术变革为新闻行业发展带来的正效应或负效应。考察新闻与经济的关系时，重点关注新闻业在创造商业价值、应对经济危机、缓和矛盾等方面的作用，以及资本控制和媒体消费等问题。考察新闻与文化的关系时，重点关注新闻活动在精英文化的大众化以及西方文化的全球化层面上作用。

2. 以媒体内容生产和职业规范为考察核心的新闻生产活动研究

首先，本文研究的 1259 篇论文中有 543 篇关注了新闻生产活动，188 篇关注了新闻从业人员，总占比超过 58%。相关研究主要涉及新闻生产的过程和新闻行业规范两个层面。其中，新闻生产过程主要集中在媒体表达与呈现、新闻来源、新闻价值、新闻选择与把关、新闻生产模式、新闻生产场域等具体方面（见表 3）。而新闻行业规范则主要落脚在对新闻职业主义的讨论：一方面从新闻作品的真实、客观、平衡、中立等层面入手展开对内容的研究，另一方面从记者的职业认知和行为入手考察从业人员的专业规范和伦理表现。其次，对论文共引文献的分析之后，笔者发现共现频次超过 25 次的 10 种文献，主题全部集中在新闻生产、新闻职业伦理与规范、新闻从业人员、新闻业的危机和转型这四大核心问题上，具体涉及媒体工作、新闻边界、新闻把关、新闻选择、媒体规范理论、全球记者调查、新闻业再思考、新闻编辑室、新闻工作范式转型等内容。

表 3 论文关注的微观主题偏向（频次 ≥ 30 次）

Table 3 Micro topic bias (frequency ≥ 30 times)

研究主题	频次	研究主题	频次	研究主题	频次
媒体表达与呈现	445	受众参与	110	概念 / 理论模型	47
媒体影响 / 影响力	324	媒体社会参与	107	跨文化传播	47
受众测量	282	新闻行业规范	107	受众内容生产	45
受众媒介使用	230	新闻生产模式	101	记者职业规范	41
受众情感与体验	194	新闻选择与把关	100	新闻消费	33
媒体（范式）转型	151	记者角色认知	73	公民身份与权利	32
媒体政治参与	147	新闻来源	61	受众信任	32

3. 以受众测量为主导路径的媒体效果研究

一直以来，效果研究都是美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重要分支。虽然不同学者对“效果”的内涵有不同的理解，但都没有跳脱出大众媒介对人与社会具有“怎样影响”与“多大影响”这两大范式^①。笔者在统计分析后发现，在本文选取的1259篇论文中，有324篇涉及媒体影响和影响力的研究（见表3），而且相较于媒介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研究者更倾向于测量媒介对“人”也即“受众”的影响，相较于“怎样影响”，更倾向于对“多大影响”的测量，而测量的维度大致包含了三个层次的内容：第一，受众的媒介使用情况，受众对新闻媒体的选择、消费、偏好与信任，受众对新闻内容的评价。第二，作为内容生产者的受众的新闻生产行为，受众内容生产对新闻生产模式产生的影响。第三，作为公民（Citizen）的受众的社会与政治参与程度，作为公民的受众在媒介使用后对政治、社会、文化现象的认知或态度改变，作为公民的受众的身份与权利等。

4. 以新闻生产模式的改变为讨论基础的新闻行业危机与转型研究

2019年1月，《新闻学》（*Journalism*）出版了20周年纪念特刊，主题为《当前新闻业面临的挑战》（*The Challenges Facing Journalism Today*）。它以身份（Identity）、信任（Trust）、自治（Autonomy）、合法性（Legitimacy）、安全（Safety）、实践模式（Models of Practice）、融资模式（Funding Models）、技术（Technology）、制度环境（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为关键词讨论了新闻业在价值观、信仰、规范和实践诸方面面临的挑战。事实上，这已不是《新闻学》第一次就此问题展开深入讨论，仅2018年，它就刊发了4期特殊主题（Special Issue）专刊：《新闻：激进主义与危机》（*Journalism: Activism and Crisis*）、《教育与职业发展》（*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新闻业的转型》（*Transformations in Journalism*）和《新闻时效性的转变》（*The Shifting Temporalities of Journalism*）。这说明，新闻学研究者已经清晰地意识到了行业危机的存在以及行业转型的紧迫性。尽管学者们讨论该问题的视角非常多元，但笔者认为，新闻生产模式的改变是他们讨论媒体（范式）转型、记者职业危机与转型、学术研究范式危机与转型、新闻教育与职业培训转型等诸多问题的基础：新闻生产的个人化（Personalization）直接塑造了新闻生产模式的交互性（Interactivity）和参与性（Participation）以及新闻从业人员的自身品牌化（Branding）等特征。而这些特征的出现使得新闻在影响公共话语（Public Discourse）、公共知识（Public Knowledge）、意识形态（Ideology）、舆论（Public Opinion）等问题上扮演的角色和产生的影响明显区别于此前，进而使得单纯从“资本”和“政治权力”两个层面考

^① 王怡红. 美国传播效果研究的实用主义背景探讨[J]. 新闻与传播研究, 1995(4): 53-58.

察媒体捕捉 (Media Capture)^① 的传统研究范式不再适宜。同时, 生产模式的变革催生了新的媒介类型。笔者对 1259 篇论文使用的关键词进行共现分析后发现, 社交媒体 (Social Media) 的共现频次远远超过了报纸 (Newspaper/press)、电视 (Television) 等传统媒介形式。与意识形态 (Ideology)、技术 (Technology)、参与 (Participation)、把关 (Gatekeeping)、情绪 (Emotion)、愤怒 (Anger)、新闻使用 (News Use) 等直接相关。而新的媒介类型又催生了新的新闻类型, 如小报新闻 (Tabloid Journalism)、超地方新闻 (Hyperlocal Journalism)、耦合新闻 (Coupling Journalism)、流动新闻 (Liquid Journalism)、超国界新闻 (Extra-national Journalism)、复调新闻 (Polyphonic Journalism)、沉浸式新闻 (Immersion Journalism)、混合新闻 (Hybrid Journalism)、建设性新闻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等。

四、结论及讨论

对发表在美国 6 本新闻传播学权威期刊上的 1259 篇新闻学论文进行分析后, 笔者得出如下结论:

在空间上, 美国新闻学研究体现出良好的国际视野: (1) 其作者来自 61 个国家和地区的 639 家研究机构, 关注区域覆盖了全球 98 个国家和地区。(2) 其努力使用全球视角或跨文化视角分析多种新闻学问题, 在微观研究主题的频次统计数据 (见表 3) 中, 涉及跨文化传播的相关研究排名居第 16 位, 频次为 47 次。在共被引频次超过 10 次的参考文献中, 有 5 种文献涉及“全球 (Global/universal)”“跨国 (Across Nations)”“比较 (Compare)”等主题词。而且, 在关键词聚类分析中, 比较研究法 (Comparative Methodology) 也是较为显著的类别, 主要用于全球媒体 (Global Media)、少数民族冲突 (Ethnic Conflict) 等关键词的研究。

(3) 其尝试关注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新闻问题。比如《新闻学研究》(Journalism) 分别于 2011 年和 2018 年针对非洲和亚洲设置了两期特殊主题的专刊, 就多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笔者认为, 当前, 从全球范围来看, 技术的变革使得传统的新闻生产模式发生了改变, 在线媒体在“本地”和“世界”之间建立起新的关系, 将专业记者、公民记者和新的合作网络中的受众联系起来, 进而模糊了新闻生产空间概念中的“本土”与“国际”界限^②, 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而美国新闻学研究表现出的上述国际视野正是对这一全球化趋势的积极响应。

① 媒体捕捉指政府或既得利益者通过网络或政治控制媒体。

② Wasserman H. Global journalism studies: Beyond panoramas [J]. Communication: South African Journal for 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Research, 2011, 37 (1): 100-117.

然而，在论及新闻学研究的全球化问题时，我们不得不正视目前学界存在的有关它的诸多争议。美国新闻学者 Seth C. Lewis 认为：“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发达国家新闻业的商业模式与专业惯例已经高度稳定和成功，因为它们具有强烈的稀缺性、排他性和控制性”“这篇文章中提及的‘作为专业的新闻’是扎根于美国或西方文本中的话语。尽管如此，依它而建构起来的对新闻职业的理解、训练和日常工作流程已经被全世界范围所承认。”^③ Michael Schudson 也以同样的自豪感表达了美国新闻价值观对欧洲的影响：在美国新闻业中被视作核心价值观的客观性原则（Objectivity），已经通过欧洲记者（他们既是重要文献的创造者，也是全球性政治问题的思考者）的自我理解和实践“占领”了欧洲。欧洲学者 Daniëlle Raeijmaekershe 和 Pieter Maesele 对此表示赞同^④。与之相对，也有诸多学者认为“全球化”标榜的全球平等是虚伪的。约翰·菲斯克等在《传播与文化研究的关键概念》一书中就把文化帝国主义与全球化作为两个互通的概念^⑤。李金铨认为：“（美国学者）罗吉斯援引那些看似客观的‘跨文化’研究，未始不是夸张美国霸权的修饰词。本质上莫非把深植于美国文化土壤的理论挪到国外去‘再生产’，把理论背后的假设‘世界化’和‘自然化’，变的只是一堆代表某些现象的数字。”^⑥ 李曦珍，王晓刚认为：“在国际社会还存在着贫富差别和强权政治背景下，文化全球化便成为了文化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等文化霸权主义的御用工具”^⑦。

事实上，本文分析的 1259 篇论文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美国新闻学研究存在着明显的空间、方法和主题偏向。首先，从相对数量来看，美国新闻传播学期刊更倾向于刊登来自美国、英国、荷兰、德国、以色列、澳大利亚、韩国七个国家作者的论文，对上述七个国家的关注度也更高。同时，美国和欧洲的大学机构是 1259 篇论文机构合作网络中的核心构成，此外，1259 篇论文的期刊引用频次超过 100 的期刊全部来源于美国和欧洲，上述数据说明，美国新闻学研究存在着较为明显的空间政治偏向，相较于世界其他地区，其更加偏重于关注那些同自己有着相同价值取向的国家和地区的新闻现象及新闻问题。此外，在研究方法上，美国新闻学研究具有明显的科学主义偏向，主要表现在其刊发的论文大多使用定量、定性以及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整体遵循科学的经验原则、数量原则和因果原则。在

③ Lewis S C. The tension between professional control and open participation: journalism and its boundaries [J].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12, 15 (6): 836-866.

④ Raeijmaekers D, Maesele P. In objectivity we trust? Pluralism, consensus, and ideology in journalism studies [J]. Journalism, 2017, 15 (6): 647-663.

⑤ 约翰·菲斯克. 传播与文化研究的关键概念 [M]. 李彬, 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4.

⑥ 李金铨. 超越西方霸权: 传媒与“文化中国”的现代性 [M]. 香港: 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4.

⑦ 李曦珍, 王晓刚. 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渗透与冲突——媒介“软权力”支撑的“全球传播”问题探讨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8 (2): 2-9+93.

研究主题上，美国新闻学研究呈现出以古典功能主义为特征的偏向，主要表现在“以媒体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参与为考察重点的新闻功能观研究”“以媒体内容生产和职业规范为考察核心的新闻生产活动研究”“以受众测量为主导路径的媒体效果研究”和“以新闻生产模式的改变为讨论基础的新闻行业危机与转型研究”四个方面。笔者认为，美国新闻学研究在方法和主题上表现出来的特征主要来源于其主流新闻传播学研究范式，也即“把媒介与权力结构关系视为当然，只以工具的眼光孤立看媒介产生什么效果”的哥伦比亚范式^①的影响，该范式根植于以美国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下的认识论基础：对资本主义制度下传媒业赖以生存的商业模式的认可，对资本主义文化下“传媒业与政治之间应保持相对独立关系”这一职业惯例的认同。显然，依据以上证据就得出美国新闻学研究存在全球文化霸权的结论是鲁莽的，但“作者国籍的多元”“关注地区的广泛”与“研究方法与主题的整齐划一”三者并存，的确可以在一定程度反映出美国新闻学研究对其他研究范式的排斥。

那么，中国新闻学者能够从中借鉴什么？首先，在新闻生产全球化大趋势背景下，中国新闻学研究必须积极参与到其他国家发起的全球性新闻学研究课题中。为全球新闻学研究提供丰富的中国经验。其次，中国新闻学研究应该主动组织和发起一些全球性研究课题，尤其应主动关照被美国等西方国家学者忽视的亚洲（尤其是东南亚、南亚、中亚）、非洲、中东等地区的新闻学问题，并尝试寻找区别于西方但又同样科学有效的研究范式，进而为丰富全球新闻学研究范式贡献中国力量。其次，中国新闻学如何提高美国新闻学期刊的发文量，进而提高国际影响力？事实上，自 2017 年以来，美国新闻传播学期刊对中国大陆的关注呈持续增长态势。在本研究选取的 1259 篇论文中，共有 42 篇关注到中国问题，频次位列 98 个国家和地区的第 7 位。然而，与之形成反差的是中国作者的发文量并不高，而且，有中国作者参与且以中国本土问题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仅 9 篇。这一现象的产生一方面根源于美国新闻传播学期刊对中国文化土壤下孕育的新闻职业观、功能观和价值观的排斥，另一方面也源于中国新闻学研究自身存在的诸如选题、方法和创新等方面的问题。笔者认为，中国新闻学想要赢得新闻学研究的国际话语权，既不能无视世界一流学术成果，又不能一味迎合美国的理论范式，而应该与其保持良性的互动和交流，并在此过程中对其进行持续性的、批判性学习和吸收，最终结合中国自身的在地经验，发展出带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理论体系。其实，中国的近邻——韩国，在美国新闻学期刊上表现出了良好的韩国视野和全球格局。其作者总量为 61 位，第一作者发文量为 27 篇，两个变量均排在国家排序中的第 7 位（见图 1 和表 2）。

① 李金铨. 传播纵横：历史脉络与全球视野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而且，虽然他们会顺应美国新闻学研究的主题倾向，但仍努力从韩国本土经验出发，对相关理论给与补充甚至挑战。比如，在“记者创伤事件暴露与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一研究领域内，美国学者经过调查，证实了暴露在创伤性事件中的美国记者确实存在创伤应激障碍，但是他们对于这种现象的普遍性、严重性、对记者职业活动产生的影响，以及上述因素的影响变量等问题缺乏实证研究。韩国学者通过开展全国记者调查，对记者创伤应激障碍的概率、程度、影响力等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了影响上述问题的核心变量：创伤事件暴露程度、职业生涯长短、使用功能失调的应对策略、缺乏社会支持和消极信念^①，为该研究提供了韩国经验。此外，他们还通过开展跨国合作（国家间合作频次为36次，位列国家合作频次排名第8位，见表2），关注其他国家乃至全球范围内的新闻问题，进而提高自身的国际参与度和知名度。这一学术表现力值得中国学者借鉴。

最后，美国新闻学研究如何用更加包容的态度对待其他文化背景下的新闻学知识生产成果，非西方国家新闻学研究者如何坚守文化自信，为全球新闻学研究提供有效的研究范式，东西方学者如何既彼此独立又平等交流，将是值得谨慎思考的问题。毕竟，“如果全球化研究包括全球一级的新经济、政治和（潜在的）象征性力量中心的崛起，那么它还应该关注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即近几十年来，扩大大众媒体生产和消费的最重要地点不在历史上的‘西方’”^②。

① Lee M., Ha E H., Jung K P. The exposure to traumatic events and symptoms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mong Korean journalists [J]. Journalism, 2018, 19 (9-10): 1308-1325.

② Preston P. Review article [J]. Journalism, 2010, 11 (1): 111-116.